

“你跪着,我也只能陪你跪着。”面对下跪央求不要扣留小车的占道经营摊贩,城管曹祥超无奈选择“对跪”。近日,武汉街头这戏剧性一幕,反映出城市公共管理的深层尴尬。

在中国传统中,下跪是一种符号,语意是乞求,姿态是示弱。在权利平等成为社会基本意识的年代,摊贩牺牲个体尊严来守住谋生路径,让人感受到屈膝之下难以承受的重量。

或许正是如此,城管队员也压力沉重,特别是在民意注视下时,因而选择“陪你跪着”。正如当地城管部门负责人所说,“如果当天摊贩下跪而城管队员没有下跪,照片传到网上,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城管部门遭遇强大舆论压力,更可能是曹祥超自己“无奈走人”。

城市游摊走贩遭遇的困境,屡有所闻。《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等网络图片,各种新闻勾画出的“猫鼠游戏”,都折射出他们在城市中逼仄的生存空间。然而,城管又何尝不是如此?崔英杰案、夏俊峰案中,被刺死的城管同样是应该尊重的生命。面对整顿市容市貌、道路秩序的要求,城管即便穿上制服,也往往既缺少执法的依据,又缺少工作手段。此次对跪,不过是颇为戏剧化

社会管理者应以更多制度创新,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 用合理的制度破解“对跪”尴尬

地再次展现了城管的尴尬。更何况,很多城管同样来自弱势群体。

城管与摊贩的对跪说明:在一个权力必须尊重权利的时代,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权力本身也会掉进被动的窘境。当双方都不愿意用尊严为不合理埋单时,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冲撞很可能会以悲剧收场。

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很多地方没有把流动商贩纳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体系中,而是以临时化的管理思维,对待这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行政理念下,城市管理的规则制度,往往难以表达出足够的制度善意。通过“禁摆区”来把小商贩赶出街区,却不能为小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必然会遭遇抵制,从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要么更多对抗,要么陷于尴尬。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管制度,其初衷是在国企改革、城镇化加速、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增多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维护城市秩序。这样的设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这

种带有一定应急性的“委托执法”模式,10多年来未能从源头上加以完善,反而逐渐固化下来,成为诸多矛盾的“下水道”。

城市之大,在于能海纳百川。如果能以更开放心态接纳流动人口,划定区域与时段对小摊贩进行疏导,变管理为服务,城管的执法压力肯定会大为减少。如果能加强监督,成立专门的监管中心,依法依规处理问题,小贩也能更多理解。而引导摊贩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与约束,甚至引入社区、社会参与其中,也都是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必要内容。

街头对跪的城管和小贩,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然而,社会管理者更应看到背后的冲突,加强制度创新,以更加充满善意、以人为本的制度,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让小贩不用下跪求生计,也让城管能够站着执法。

人民日报(单士兵)



■ 3月31日下午,武汉江汉区城管曹祥超,和一名摊贩面对面跪着,长达1分多钟
视频截图

媒体调查基层环保局 污染企业成为其收入来源

潇湘晨报 “县环保局目前有157人,其中行政编制11人,财政全供事业编制24人,剩下的133人均为自收自支人员。他们吃什么?只能吃‘排污费’。”河南一位县环保局长透露。

“污染企业咋成了我们的衣食来源,我们该保护环境呢,还是保护污染企业?”记者在中西部一些地区采访,一些县级环保局长表达困惑。

近年来各地少有对排污费的专项审计。河南审计部门2009年曾进行过一次。那次对某市6县(区)排污费审计时发现,6县(区)环保局实有人员765人,财政供给人员159人,占总人数的20.8%,自收自支人员606人,占总人数的79.2%。

关于环保局内编制具体安排,15日下午4点半,记者采访了几个环保局,工作人员都不愿意多谈。河北沧县工作人员称,自己不是相关负责人员,并不清楚。温州瑞安

工作人员说单位人多,具体不清楚。山东滨州工作人员说平时同事也没关注谁是不是编内,对这个单位整体数据不了解。湖南省委党校教授汪太理说,机关的常规编制信息,不应该成为秘密。

近年来,各地均推行了排污费征管“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双线运行”机制,力图确保排污费足额用于环境治理。但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排污费”依然在污染企业和环保局之间“转圈”:地方财政将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缴入国库后,经预算安排,仍返还环保部门,名义上是用于环保自身能力建设,实际上是默许环保部门将此费用用于人员经费支出。

由于有了“排污费”这块收入,环保局成了创收余地大的“好单位”,中西部许多基层环保局成了“超编局”,人员严重超编,陷入“收钱养人,养人收钱”怪圈。

“把群众放心上就能把事干好” ——锦州市社区民警孙建设印象



最美基层干部

憨厚的一笑,让你对他充满信心;朴实的话语,让你感受到他的真诚。孙建设,为了一个信念,为了一个理想,干了18年社区民警。他成功地成了这个小小社区的“名人”,成了这片土地的“名片”,成了百姓的“家里人”。

把群众放在心上,是他成功的理由。2007年,破解社区治安难题的“孙建设工作法”被媒体介绍到全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普通民警在小社区照样可以干出大事业。

1995年,孙建设从部队转业到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石桥子派出所,成为一名普通的社区民警,从此他将根扎在了百姓中。

他在总结和社区百姓亲密接触的过程时,提出了“五步法”:第

一步,替初次见面的百姓解决实在困难;第二步,利用节假日到居民家中走访;第三步,对一时见不上面的住户,采取留电话或委托邻里转告,先预约后走访;第四步,对不愿见面的住户,反复登门,以诚感人;第五步,对少数心存戒备的群众,采取与查煤气、水、电的工作人员一起入户的办法走访。“五步法”,让孙建设解决“入户难、见面难、沟通难、支持难”等社区民警普遍面临的难题,也成了锦州市公安局社区民警做好社区工作的“法宝”。

社区百姓说,孙建设是靠真诚为群众办事打动了他们。

18年来,他工作过的3个社区都被评为优秀社区,他所在的警务室被锦州市公安局命名为“孙建设警务室”。他现在工作的文昌社区连续10年无刑事案件发生,无火灾、无黄赌毒现象及群体性事件发生。
新华社(千力)

“解决雾霾至少需要十年。

谁知道十年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毛病呢?”过了半年每次外出均需准备口罩的日子后,马来西亚人林(音译)终于决定离开。在此之前,她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1年。一同离开的还有她的丈夫,美国人凯和他们11个月大的儿子。

孩子需要好的空气

尽管北京依然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但糟糕的环境让她

的魅力打了不少折扣。“我们每天都会去看美国大使馆发布的PM指数,空气好才敢带孩子出门。”林说。她清楚地记得,在空气最糟糕的时候,她和同样在北京工作的丈夫一个月只带着孩子出门六次。“但孩子不是应该每天都出去晒太阳吗?”

林是华裔马来西亚人,2002年来到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公共关系专业的她先后供职于多家企业,林喜欢南锣鼓巷,常去逛后海和北京的老胡同;她说她喜欢这个城市“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变化”。

“今天你看到一个不错的饭馆,也许明天它就不见了;然后又会有一个新的好玩的地儿冒出来。”林说。在很多像林一样的外国人看来,如果北京不是经常穿上灰蒙蒙的外衣,那她一定比现在更具吸引力。

“孩子需要好的空气。可是在这里却变得越来越难。”她说。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瑞典人马克。在朋友眼里“接地气”、“特哥们儿”的他在北京已经生活了22年。去年他被查出患有肺癌。“我不想说这个跟北京的空气有关系,但是身体肯定更重要。”另外一个促使他下决心离开的原因是:他的新婚妻子刚刚怀孕。

除了林和马克,林的朋友安妮(化名),也和她的美国丈夫选择离开北京,去了芝加哥。“美国的就业环境并不乐观,但总比天天在家里用空气净化器好。”林说,她不劝朋友离开,

但是有朋友想走,她会支持。

酒吧外籍顾客减少

一些外籍人士的离开正悄悄影响着北京这座城市。三里屯的部分酒吧,比如“目的地”和“爱尔兰”,都已经呈现出“外籍顾客减少的趋势”。

“你不知道这雾霾天有多麻烦!”在“First Floor”酒吧,有着温和嗓音的托尼(音译)谈起北京的空气污染时声音提高了八度。他说,在过去一个月中他有三位朋友选择离开北京,其中一位因“深爱北京文化”而在京工作七年,但却因为雾霾引起过敏反应而离开;一位女性朋友因忍受不了每天戴口罩而去了日本;另外一位则是为了刚刚出生的

“离开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 部分外籍人士 因雾霾离京

孩子选择了回澳大利亚。空气污染也成为了外资医院里医生们关注的焦点。

在和睦家医院工作的圣西睿智医生(Richard Saint Cyr)坦陈,“糟糕的空气令很多病人都相当紧张,尤其是那些外国父母,深恐孩子健康受到损害。”

同样的抱怨也出现在国际学校的外籍师生当中,北京哈罗学校的学生王民(化名)刚刚在父亲的劝说之下转学香港哈罗学校,到达香港不久,她就发现,三位已经从北京辞职的老师也来了香港,理由和他一样——受够了北京糟糕的天气。

并没证据表明,在京生活的外籍人士因为天气原因离开北京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毫无疑问,这影响了一部分人的选择。很多外国人在这座城市光芒四射的魅力和它糟糕的空气之间,显得去留两难。

31岁的英国人珍(音译)三年前为学汉语而来北京短暂工作,自此成为“胡同摄影发烧友”。两年前她随新婚丈夫回美国定居,但“回北京”的想法却从未改变。工作定在纽约的丈夫不时拿理由“搪塞”她,而最新的一个是:雾霾。这一次,珍选

择了对自己的丈夫妥协。

“天气情况对于外国人来北京是有很大影响的,很多职位都没有人来申请了,除了非常高薪的职位。”北京福瑞仕招聘公司人力资源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她说,跟去年同期相比,整体应聘者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申请北京和上海的职位的求职者明显减少。

“当初给诺基亚招聘的时候,我们能给它推荐40多个外籍员工。但是现在,数量很少。”除了人数减少,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招聘公司需要给外籍申请者做大量的解释工作,“他们都会问,北京的污染很严重吧?”

不仅是申请职位的外籍人士在减少,为这家招聘公司服务的外籍员工也已经开始从高峰期的12个人减少到目前的5个人,而且在职的员工合同长度也从一年的长期改为了两三个月的短期。

数据显示,北京市一季度三个月的雾霾天数分别为23天、10天和21天。

空气好了还会回来

“这(离开)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林说。她自己也不是没有犹豫过。“离开北京,这么多年的事业积累几乎白费。这里还有很多好朋友。到了美国,一切都要重来。”但相比北京的雾霾天,至少家乡马来西亚“从来不需要戴着口罩出门,这是很基本的权利”。

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在4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今年一季度北京空气中的二氧化氮和PM10浓度均同比上升了20%以上。在污染最严重的1月份,两项污染物浓度同比增加47%。陈添说,造成重污染的根本原因是污染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根据测算,北京60%以上的PM2.5都是“烧”出来的,包括烧油和烧煤。

北京市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些措施显然不是一日之功,但无疑让人看到了希望。林说,只要北京的空气变好了,她还是有可能会跟先生一起回来,“人一生本来就会去很多地方。”
经济观察报